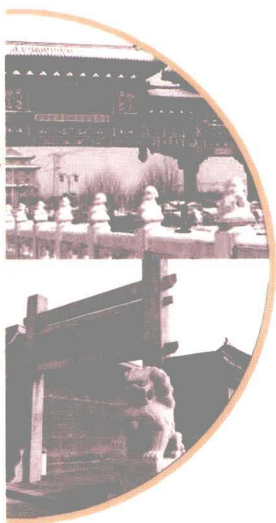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丛书

Research on the Manchu Ethnic Minority
around the 1911 Revolution:
Center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chu and Han Nationality



辛亥革命 前后的满族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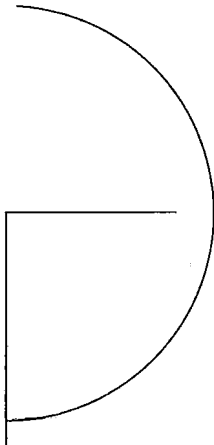
常书红◎著

——以满汉关系为中心

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on the Manchu Ethnic Minority
the 1911 Revolution:
r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chu and Han Nationality

辛亥革命 前后的满族研究



——以满汉关系为中心

常书红◎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以满汉关系为中心/常书红
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2251-0

I. ①辛… II. ①常… III. ①满族-民族历史-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7790 号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 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 ——以满汉关系为中心

著 者 / 常书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赵云田

责任校对 / 李向荣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251-0

定 价 / 39.00 元

印 张 / 14.4

字 数 / 236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北师大历史学院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镇，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在北师大历史学科中，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举足轻重。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最早设立的学科点之一，在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下，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科建设长足进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方重镇。该学科点是国内最早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单位之一，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的首批校级重点学科之一。

近年来，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这些成果，繁荣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园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

如一。

当然，学术探索无止境，作为探索旅程中的专业研究成果，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1 年 3 月

序

对于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民主共和新时代的伟大历史功绩，人多耳熟能详；但是，实际上，此种认识尚有待于深化，尤其是辛亥革命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自觉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还是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重要认知领域。梁启超曾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华国民在人类进化史上创造的一大奇迹；因为，“须知以如此庞大之民族，散布于如此广漠之国土，数千年继继绳绳，日征月迈，在我国民视之若素，然以世界史的眼光观察之，实邈然更无匹俦”。^①以汉族为主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多民族长期融合的产物，其本身即为中华国民的伟大创造和对于人类的巨大贡献。不过，中华民族的源起固然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但在近代之前，她尚处于自在的阶段；只是到了近代，缘反帝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洗礼，才得以跨入了自为的阶段，形成了现代的民族自觉。在实现这一飞跃的过程中，辛亥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第32页。

亡”。这里所谓的潮流，就是指十八世纪以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世界历史大趋势。故他在《〈民报〉发刊词》特别指出，“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然而，“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浸成了内忧外患，亟亟可危。欲救中国，端在顺应世界潮流，去专制，行共和：“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① 尽管孙中山创建的民国并未最终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但它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毕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解除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束缚，从而为“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把握了机遇，争取了时间，开辟了道路。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中国作为大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曙光在前，正可以说“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是百年中国发展的三大里程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强调，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路。此其一。

辛亥革命洪波涌起之时，“排满”思潮也曾随之风起云涌。今天我们展读“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为留日学生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撰写的《宣言书》以及《国粹学报》上连载的黄节著《黄史》等，仍不难感受到历史的风云扑面而来。辛亥革命的风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排满”思潮而鼓荡起来的。但是，耐人寻味的是，随着革命军起，“排满”的声浪却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销声匿迹了。民国元年，孙中山发布《中华民国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75、76页。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开宗明义第一条，即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以实现“民族统一”。从此，不仅“五族共和”取代了“排满”的宣传，而且，不久“中华民族”一词继起，复很快取代了“五族共和”，成为了至今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的民族共同体的符号。“排满”思潮此种大起大落的历史现象，可作两方面的解说：一是清王朝一身二任，既是代表封建统治的君主专制政权，又是代表满族亲贵利益的种族政权。在辛亥革命时期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语境下，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满”思潮，其与革命思潮并兴，正反映了人们心中长期积蓄的对清王朝种族压迫愤懑情绪的渲泄。它既是助益革命的手段，同时也未尝不是表达了人们心中的意愿。二是辛亥后，“排满”思潮悄然引退，若鸟过无痕；满族很快融入大社会，亦波澜不惊，其间化解民族心结于无形的伟力，乃源于中华文化。武昌首义当日，章太炎尚在日本，为安抚人心，他主动致书留日满族学生说：此前不免“发言任情”，现在局势既变，“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岂复重修旧怨”？汉、满、蒙、回、藏各族，大家都是“中国人民”，在共和之下，自然一律平等。^①既是“排满”主将，又是国学大家的章太炎，其带戏剧性的转变，无疑具有典型性。他以“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立论，强调的正是文化。它反映了中华文化宽容的特质与凝聚整体的智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文化之伟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底，它有赖于结束帝制的这场革命为之提供了历史的前提。质言之，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

①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第519、520页。

等等。本书不仅资料翔实，而且不囿陈说，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同时，文字流畅，富有可读性，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的出版，无疑将进一步丰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侧面，深化对近代满族社会变迁，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

满族社会缘辛亥革命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动及其融入大社会，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自觉的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相信作者能继续努力，取得新的成绩。

郑师渠

2011年1月18日

目录

序	郑师渠 / 1
绪论	1
一 选题缘起	1
二 学术史回顾	4
三 资料及思路	7
第一章 清代满族的地位与角色	11
一 满族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根本地位	11
二 “旗、民分治”与满汉畛域	23
第二章 近代社会变动与满汉关系	50
一 清王朝危机与满汉权力格局的变动	51
二 “旗、民分治”的困境	66
三 晚清改革视野下的满汉关系	80

2 ◆ 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满汉关系	126
一 革命期间的满汉关系	126
二 满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推动和参与	140
三 清帝逊位与《清室优待条件》的签订	143
第四章 辛亥革命与民族认同	157
一 近代民族主义文本的二元化：“革命排满”与 “满汉一体”	159
二 文本的对立与趋同	170
三 文本突破：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	178
第五章 民初的满族社会与满汉文化交融	187
一 民初的满族人口及其流动	187
二 民国政府与八旗生计	192
三 八旗团体与集会	204
四 满族的社会分层与职业分布	209
五 满汉文化的交融	234
结语	252
主要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71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

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贡献，乃在于它颠覆了绵亘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共和国。就此，学界多年来已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被推翻的是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族贵族政权，那么，作为“天潢贵胄”之满族贵族地位的根本变化及其权力主体角色的失落，究竟如何影响了满族自身的发展向路和满汉关系的发展？对于清政府的“平满汉畛域”政策与满族的平民化历程我们当如何予以考量和评价？为何一度力主“排满”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鼎革后会迅速转向宣播“五族共和”？这一影响又是如何渗透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以及中华民族的近代发展历程之中的？这些，恰恰是我们在审视满族入关以来最深刻、最巨大的历史变革，以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至为重要的关节点时所应深思，却又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并未加以充分关注的问题。

作为擅长骑射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满族在“以弓马定天下”后，及时将它在关外推行的八旗制度与中原儒学文化观照下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整合，构筑了有清一代独特的政权结构和社会控制体系，从而既确立了满族“文膺心膂”、“武寄干城”的根本地位与角色，又使满族贵族统治获得了“合法”的文化支撑，奠定了其后两百余年的统治基础。然而如此精心的设计并非万无

一失。一方面，建立在“旗、民分治”基础上的八旗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与危机，例如，在急剧膨胀的八旗人口与优养八旗政策之间，统治者力图保持满族种族特性的自觉意识与满人汉化的不自觉趋势之间，以及满族贵族利用汉人能够认同的儒家文化和代表它的汉族官绅来维持统治秩序的策略选择与其保证满族贵族专权的统治本能之间，都存在着八旗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而这一制度将政治、军事、经济、教化、司法等多项功能糅为一体的多元复合式结构，又决定了无论它哪一部分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其他部分功能的行使，从而导致整体失衡乃至解体的危机。实际上，早在清代前期，八旗生计的贫困，八旗兵的衰堕，满族的汉化等种种迹象已次第露出端倪。另外，满汉权利的不平等也造成满汉关系的长期敏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汉族民间社会援以鼓荡反清革命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

近代以来，外患内忧，交侵而至。迄 19 世纪 50 年代，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八旗兵的衰败，导致湘、淮军异军突起。湘、淮军的应时而兴，不仅拉开了清王朝军事变革的序幕，也推动了其政治变革的进程。而此两项重要变革，虽使王朝权力结构中的满汉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却未能解决满族贵族统治的根本危机。1911 年，以“排满”相动员的辛亥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颠覆清廷，创立民国。满族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变迁，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而与满族变迁密切相关的诸多重要事件，如平满汉畛域特别是变通旗制措施的推行，从“排满”革命爆发到“五族共和”政策出台的奇特历史运行轨迹，以及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卵育生成等，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

故此，以满族的变迁为视角，以满汉关系的变化为中心，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且

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两个维度,更加深入地把握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同时获得对深厚、宽容而大度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更为深刻的认识。本书的主旨,即在于考察辛亥革命前后(1898~1924年),随着清朝统治的衰落、崩溃,以及八旗体系的松动、瓦解,满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以“旗”、“民”社会的一体化作为切入点,透视剖析这一时期围绕满族地位的变迁,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习俗风尚诸领域发生的种种移易,进而从民族融合的视角,揭示辛亥鼎革背景下社会得以平稳过渡和发展的深层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者对于“满族”这一概念的界定尚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从血胤与族群的角度出发,认为满族即特指清代满洲八旗的成员。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满族本身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从满洲名称出现,^①迄清朝覆灭的三百余年间,在满洲八旗中,不仅包含了满洲成分,而且汇入了汉族、蒙古族以及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非满洲成分,同时,在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中,也渗透了满洲成分,概言之,在八旗体系中,各民族长期杂居共处,交相融合,进进出出,你我难分,早已在文化、观念、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诸方面逐步趋同,融为一体,人们之间往往“但问旗、民,不分满汉”,因而凡在清代没有出旗

① 天聪九年十月庚寅,皇太极谕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见《清太宗实录》卷25,天聪九年十月庚寅条)日本伍石书轩刊本《清三朝实录采要》所载与此处引文稍异:“我国原有满洲、哈达、吴喇、叶赫、辉发等名。乃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勒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许(称)我国满洲原名”。从此,“满洲”正式作为一个民族名称被固定下来。那么,为什么要废除诸申旧称呢?据王钟翰先生考证,诸申本为明代女真社会中的自由民,明清易代之际,满族社会在进住辽沈地区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发生巨变,自由民阶层的身份大量下降,沦为隶农或奴隶,“诸申”显然不再能代表一个民族共同体,故被易为满洲。参考王钟翰《清朝满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史料》,《中国文化》第13期。

的八旗成员均可视作满族成员。如著名满学家王钟翰先生曾就汉军旗人的民族归属提出：“凡是既已出旗为民的大量汉军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应该算作汉族成员；否则就应该把他们当作满族成员看待。”^① 这一观点已然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而其立足点，恰恰是以是否“在旗”作为划分满汉的标准。事实上，尽管清代各地驻防中既有满洲八旗，也有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但无论在官方文书还是方志中，均习惯称之为“满营”或“满城”。鉴于本书切入的角度，恰恰是八旗制度的变迁，旗人的平民化，与旗、民社会的一体化，而且置身于清末“排满”风潮及辛亥革命前后平民化转型过程中的“满人”，无论在汉人眼中，还是就其自身的认同感而言，基本就是八旗成员，^② 故此，本书将八旗组织中的所有成员作为研究对象，行文中所提到的“满族”与“旗人”，属于同一范畴。^③ 就时间范围而言，本书基本以 1898 年至 1924 年，即自戊戌维新至溥仪出宫为界限；在区域范围上，则包括北京和各地驻防。

二 学术史回顾

长期以来，学界对辛亥革命前后满族历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尽管关于清史与满学的研究日趋繁荣，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更一直为学界所重视，特别是近十余年来，

① 王钟翰：《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 13 页。

② 有些满洲八旗即使改隶汉军后，依然保持着对满语及满洲文化的认同，如汉军杨钟羲其先祖早在乾隆时期就被逐出正黄旗满洲，贬入汉军，但他一生中始终致力于研究和整理满洲及八旗文化，编纂、撰著了《白山词介》、《八旗文经》（与盛昱合编）、《雪桥诗话》等多部关于满文化的巨著。

③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八旗体系内部，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地位有明显区别，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汉军往往被视同汉人。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载：“汉人以罪至者，虽与汉军不同，每与汉军为伍，在满洲与异齐，满洲则总呼为汉人，汉军亦不以此自别，盖与京师汉军有截然不同者。”（光绪南清河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 帙第 4 册，南清河王氏铸版，第 362 页）

涉及这一领域的专题研究日渐增多,如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朱东安《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历史档案》2007年第1期)、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等,但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在国内,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为考察对象的整体研究尚付阙如。在海外,直至目前,美国学者路康乐于2000年付梓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1861 - 1928*,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是唯一一部从民族关系的视角,以满族的兴衰变化为切入点,较完整地展示了自慈禧摄政,到载沣摄政时期,直至辛亥革命以后满汉关系状况及其对政治权力影响的著作。

从已有成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就覆盖面而言,所涉专题不多,关注角度多侧重于生活、习尚与民族关系;就时间段落而言,多集中于清代;就空间视野而言,多聚焦于某一地区范围,或京旗,或驻防八旗,甚至是京旗中的某一部分(如圆明园八旗、外火器营、健锐营、檀营),或驻防中的一支(如广州驻防、荆州驻防等),但毕竟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前提和基础。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由19个报告组成,全书30余万字)和《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全书18万字)。从1958年开始,编写组历时27年,对北京、辽宁、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四川、广东、山东、河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沈阳、西安、银川、成都、广州、哈尔滨、旅大、抚顺8个地级市,新宾、璦琿、凤城、益都、青龙、易县、兴城7个县以及5个乡村满族社会历史情况(包括族源、历

史演变过程及现状等)进行了广泛调查,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其中,《满族简史》就满族族源,经济形态的转化,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发展及其活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论述满族历史的著作。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对清末平满汉畛域情况作了简短论述,而这部分内容正是为一般满族史研究者所忽略的。金启琮所著《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和《北京城区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回顾了民初北京城区与郊区满族的民俗风情、性格气质、心理结构、审美情趣及遭遇、变迁,所涉内容多属作者亲见亲闻,对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满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通过对16位旗人妇女的访谈,并对获得的口述资料与相关文献进行印证甄别,为我们了解以下三方面的内容提供了相对可靠的资料基础:第一,相对汉族而言,从清末民初走过来的满族妇女对于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以及具有的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第二,这些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状况与族际通婚状况如何;第三,她们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家庭变迁和个人的生活经历如何。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北京出版社,2002)收录了由32位满族人士撰写的39篇文章,内容涉及北京满族的百年沧桑巨变、家世与人物、社团组织、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史料拾零和满族聚居区等,具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刘小萌所著《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则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系统研究北京旗人社会的史学专著。该书通过对清代北京旗人内部的经济关系、旗地类型与区别、旗民的地域关系、旗民的经济关系、旗民的文化关系、旗俗的流变与“汉化”、晚清旗人的“贫困化”与八旗制度改革、辛亥鼎革与旗人社会的瓦解等专题分别进行探讨,大致勾勒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变化的脉络与轮廓。柯娇燕所著《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之灭亡》(普林斯顿大学,1990)则